

農村中的社會創新：斗南、池上與美濃的比較

鍾怡婷、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在朝向去管制、撤除保護並開放農產品自由貿易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重組影響下，1980年代台灣農業面臨結構轉型。農業政策從過去偏向計畫經濟並主導銷售與出口的模式，轉而開始倡導水稻轉作其他具內銷需求的商品作物，並且積極鼓勵稻作休耕與品質轉向，試圖調整生產主義導向的農業，使其往「精緻農業」或「休閒農業」的方向發展。

過往的農業與鄉村研究大多認為，農業受到全球經濟重組的影響，可能步上瓦解的道路，或者是朝大規模農業發展成為全球化食物生產勞動分工的一環。就整體結構而言，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影響下的台灣農業，呈現了衰退甚至去農化（deagrarianization）的現象。從產值來看，台灣農業佔整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在1951年是32.3%，到2000年時只佔2.1%，近十多年來佔比約為1.65%，同時，農業就業人口也自55.5%降到5%。休耕面積在1984年只有5千公頃，自2004年至今每年平均皆有20萬公頃農地休耕。這些數字做為農業經濟衰退的指標，反映了去農化的現象，以及隨之而來農村失去活力（deactivation）的趨勢。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屬於小規模家戶生產型態的台灣農業應當步向瓦解並且被資本吸納，成為大規模種植、企業經營並整合進全球食物供應體系的農業生產模式，而農民將離農成為投入工業的勞動力，或是受僱成為農場中的工人。農村要不成為失去農業生產活動的空間，要不就是失去居住人口成為空洞化不再具有農村社會與文化特性的地理區域。然而，在實際上台灣的農業並沒有因資本主義的不斷衝擊而瓦解，即便衰退卻仍舊頑強地與之對抗並積極尋找不同出路來面對經濟問題，甚至更進一步地也嘗試解決主流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社會問題。這些現象促使我們重新去理解農村並且探問：面對結構，農村是否只是處於被宰制的命運？是否只是被動接受而不具能动性？如果不是，那麼農村展現的能動與主體性覺醒從何而來？本文試圖探討台灣農村面對全球農業經濟重組的結構下出現什麼樣的在地能动性（local agency）對其進行回應，藉由聚焦農村中的社會創新行動，來勾勒這些在地行動在當代所展現的另類可能及其背後驅動力量的類型。

有別於科技創新，社會創新的核心在於讓擁有不同知識與經驗的行動者形成連結並展開協作式的集體行動，故本文將聚焦關注那些支持組織與制度變革之集體行動與過程。透過斗南、池上及美濃這三個農村中之社會創新案例來進行探討與比較，本文

嘗試提出台灣農村能動來源的三種類型，斗南為農會驅動型、池上為地方社團驅動型、美濃為社會運動驅動型。

斗南做為農會驅動之類型，透過土地的整合利用發展出規模化經營模式，農會扮演著企業角色以獲利為目標進行生產與銷售，但在利潤分配上卻又採取平均主義並且不傾向壟斷與獨大。他們認為農會存在的價值在於創造最適規模的家戶生產型農業，並協助個別農戶採取共同銷售來提高收入，更維繫著一公基金制度來減少市場價格波動所造成的損失。池上做為地方社團驅動之類型，展現了一個農村當中多元活躍的社團對在地社會、文化、環境、經濟甚至治理模式的正面影響。池上當地因興趣、慈善或社會福利而集結的各個團體，其活躍為池上帶來豐富且多元的集體生活，而後成為地方認同的基礎並形成守護大坡池自然環境的集體行動。在經濟上，「池上米」地理標章認證制度不僅帶來稻農收益提升，亦創造了公積金再分配到社會福利與公益事業。美濃做為社會運動驅動的類型，向我們展示了社會運動帶來對主流發展的反思行動，對當地農業與觀光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反水庫運動創造了知識份子返鄉並扎根在地的集體行動，他們成為美濃當地農業轉型的重要影響力量，不僅在象徵層次上促進了美濃做為地方與身份之認同，二方面將另類農業生產與消費模式之概念引入與實踐，使得美濃有著一波接一波的各種返鄉歸農行動，並且成為各種有別於主流發展模式的實踐場域。

本文指出，面對結構力量，台灣農村中有其積極面對挑戰與回應的行動與活力來源，雖然有來自國家補助等外在資源的支持，但不能忽略其內生性的動力。相較於過往採取社會病理性角度來理解農村，藉由對台灣農村進行其能動性之理解與類型化，我們認為此一研究取徑能夠對勾勒台灣整體社會的另類理想與另類可能帶來貢獻。

關鍵字：社會創新、在地能動性、農村發展、另類可能